

从1942年亲身体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盛况,到《菜园小记》《记一辆纺车》等反映延安时期的散文作品,吴伯箫是以践行毛泽东《讲话》文艺思想的主流作家身份进入文学史的书写领域。然而,通过对吴伯箫及其文学作品的深入剖析,我们发现吴伯箫是一位显示出了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他早期的文学活动(1938年4月吴伯箫到延安之前)蕴含着现代性的文化反思。吴伯箫早年的文学活动,又以1931年他从北师大英语系毕业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

吴伯箫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的文学活动,是在“五四”现代文学革命的促发下开始的。

1919年“五四”运动传到山东时,吴伯箫正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他积极响应“民主”与“科学”的时代风尚,参加学校里组织的各种反日活动,并开始阅读《新青年》作家群的白话文学作品,如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但他在写信与写作时,还是采用文言文,所以说,吴伯箫这一时期对新文学革命的理解与接受还是一种被动的、盲目的跟风行为,但白话文学的观念已经根植在他的头脑里了。等到192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在教国文的黎锦熙先生及白话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吴伯箫开始“学着用白话写作”,从这一时期开始,新文学活动对吴伯箫而言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

1925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吴伯箫先后参加了“群学会”、C.Y.等进步群众组织,他的白话文学写作,就是从为社团编写传单开始的。传单是用“简短的文字代替直接口传,不会发表在报纸上;限于时效,也不编入定期的杂志书刊”。所以,“到现在连片言只语也没留下”。但这种“准文学”的练笔之作,却是吴伯箫散文创作的起步,为吴伯箫日后“质朴无华”的散文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伯箫在北师大初期,和同道中人一起创办了进步刊物《新生》《新时代》(都只出了一期),负责编写稿件。在校期间,他还亲耳聆听过鲁迅的演讲。1930年,吴伯箫又跟曹未风、成启宇一起创办了文艺性刊物《烟囱》,沿袭着写传单时期的犀利笔锋,用以“抨击残暴,作正义的呐喊”。吴伯箫为这个刊物编写的稿件已经具备了散文的基本特点,

“有点半成品的样子”。

但吴伯箫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从他的日记写作发展而来的。吴伯箫1925年到了北师大以后不久,就开始用白话文写日记。1926年4月初,他在学校自习室看到同桌杨鸿烈为商务印书馆写小册子,在杨鸿烈的引导与鼓励下,吴伯箫将自己的一则日记寄给了《京报副刊》。1926年4月12日,吴伯箫的日记《清晨——夜晚》在《京报副刊》上刊登出来,这是吴伯箫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以此为开端,到1931年夏天大学毕业,吴伯箫先后完成了以《街头夜》《塾中杂记》《病》等为代表的41篇散文,7篇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文学作品(如《花的歌颂》《痴恋》《昨日》等),3首诗歌(《希望》《夏之午》《恳求》),1篇杂文《打倒袍褂》,散见于《京报副刊》《新中华报》副刊、《世界日报》副刊、《华北日报》副刊以及《现代评论》《骆驼草》等新文学报刊杂志上。

吴伯箫在大学阶段的文学作品,从“换取稿费解决生活困难”的目的出发,虽然作品内容上不自觉地对比光明与黑暗,写贫富悬殊,贵贱差别,内心不平”,但这种思想认知是朦胧、模糊的。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从文体上看,在艺术散文之外,尝试过小说、诗歌、日记、杂文;从风格上看,带有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学生的苦闷与感伤,“意象驳杂、情趣殊异”;从作品的质量上看,并不尽如人意,投出去的稿件“不顺利的时候十居七八”。

从总体上看,吴伯箫在北师大求学期间的文学作品属于练笔之作,与《羽书》时期的作品相比,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未达到真正的成熟,也不太为评论界所熟悉与关注。但这一时期的写作,却是吴伯箫散文创作的起步阶段,既锻炼了文笔,也开始摸索属于自己的散文风格。这一时期以《病》《涂鸦》《别前夜》《闷》等为代表的散文作品,描述了社会变革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迷茫与苦痛,具有浓重的感伤主义情调,体现出了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也开启了吴伯箫散文的现代性书写。

二

吴伯箫的文学活动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形成的,但与此同时,吴伯箫也以自己的文学活动参与着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过程。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考察吴伯箫《羽

吴伯箫早期文学活动的现代性反思

□申朝晖

书》时期(1931年9月至1937年底)的文学活动,其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办文学刊物,提携文艺新人

1931年9月,从北师大外语系毕业的吴伯箫来到了山东青岛,担任《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12月8日,《民国日报》因其进步色彩激怒了日本人,报馆被放火烧毁了。在这为期两个半月的副刊编辑工作中,吴伯箫致力于扶植文艺新人,发展新文学事业,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文坛新人通过吴伯箫之手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的散文与诗歌。

1935年7月14日,在济南乡村师范学校任教的吴伯箫返回青岛,与老

舍、洪深、王统照、臧克家、孟超、王亚平等12人借用《青岛民报》的版面创办了文艺周刊《避暑录话》,到9月15日共出版了10期。《避暑录话》是一份典型的同人刊物,它的存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但成就比较突出,老舍、吴伯箫的散文,洪深的戏剧文学,臧克家、孟超、王亚平、王统照的诗歌,此外,还有不少短篇小说、文艺评论、古体诗词、随笔,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发展演变。同年底,吴伯箫还在其任教的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学生创办的《求生》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以示对进步学生文艺事业的支持,同时,也将文学的现代性观念在学生中进行了开化与普及。

吴伯箫30年代前、中期所主办或参与的刊物,并不属于此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左联”的机关刊物或外围刊物,而是趋于进步的纯文学刊物,是具有现代思想倾向的自由主义作家集结的阵地。

(二)参加文学活动

吴伯箫1931年9月在青岛担任《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时,还兼任青岛大学(山东大学)的教务处室办事员,在这一时期,他通过工作关系结识了杨振声、闻一多、洪深、老舍、王统照、梁实秋等人,作为“文艺学徒”的吴伯箫或聆听他们的讲课、报告,或私下写信求教、登门拜访,日常工作之余,他还定期参加作家之间的交流聚会。每次聚会时,吴伯箫也和大家一样,带着自己的小说、诗歌或散文作品,彼此品评议论,互相切磋求教。在参加文学交流活动的过程中,吴伯箫受到了极大的鞭策与鼓舞,他的散文创作由大学期间懵懂的起步阶段,有了质的突破与飞跃。他不再沉溺于书斋中青年学子的精神苦闷与感伤情调,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民族国家的兴亡,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羽书》《我还没有见过长城》,以慷慨激昂的艺术风格表达了抗日御侮的爱国之情。

在参加文学活动的过程中,吴伯箫与老舍、李广田、何其芳等“京派”作家私交甚密,散文风格受其影响甚深,王统照就直言不讳地说,这一时期“伯箫好写散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与此同时,在杨振声、老舍、梁实秋等人的引介下,吴伯箫这几年的散文作品,多数发表在“京派”的核心刊物《大公报·文艺》上,如《马》《我还没有见过长城》等。此外,《海》和《天冬草》发表在“京

派”的另一刊物《水星》上。

从这一时期吴伯箫所参与的文学活动和所交往的人员来看,他虽然和“左联”成员洪深、王余杞、李辉英等人有交往,但并未加入“左联”,而是与“京派”同人老舍、臧克家、何其芳等人过从甚密,在“京派”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参与的是“京派”的文学活动。所以,在抗战之前,吴伯箫是以“京派”散文家的身份享誉文坛。

(三)文学理念与散文创作

吴伯箫散文的成熟阶段是从他到青岛以后开始的,在这里,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并在散文创作中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关于吴伯箫的散文理念,他在《无花果》里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吴伯箫回忆说,1935年他在青岛时,“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这种敢于冲破文学规范的禁锢,勇于开拓、创新的散文文体意识,显然是受到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等现代意识观念的影响。

吴伯箫《羽书》时期的散文创作,虽然自谦说并未实现自己的文学理念,但《羽书》中的“那些篇目出世是我的梦做得最熟的时候”,《羽书》也被评论家视为“奠定了吴伯箫现代散文家地位”的作品集。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共计26篇。《羽书》中收录了18篇,其中《马》《话故都》《羽书》《我还没有见过长城》,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边庄》《董》《阴鱼的鱼盆》,发表在《避暑录话》中。《忘年》中收录了3篇:《海》(《水星》一卷第五期)、杂文《理发到差》(《中流》第1卷第4期)、《记岛上居屋》。未收录的有5篇:《黑将军挥泪退克山》(《民国日报》)、《天冬草》(《水星》第一卷第一期)、《雨》(《北平晨报学园》,1935年2月21日)、《黑将军》(《大公报·文艺》,1936年9月30日)、散文《记乱离》。散文作品之外,吴伯箫还在1935年9月15日《避暑录话》第10期上发表了诗歌《秋夜》。

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从思想倾向上看,体现出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关注与思考,尤其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孤独、苦闷与感伤,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如《话故都》中“一别两易寒暑,千般都似隔世,再来真是万幸了。际兹骊歌重赋,匆匆归来又

丰硕的无花果

□张永东 汪 洁

吴伯箫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别具特色、堪称一家,在我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迫随着时代的脚步在自己的园地里辛勤垦植、耕耘50余年,先后创作了200多篇散文,在其各个时期都写下了精辟动人的篇章,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不断焕发出新的气息,结出新的丰硕的果实。他曾在晚年谈到自己散文时说:“可能我的艺林里只有无花果一科。”这句自谦之词中道出了他质朴无华的散文艺术风格。无花果没有绚烂多姿的花朵,它不炫耀,不矫饰,外观质朴无华,只是不声不响地奉献果实。吴伯箫的散文,确有着与此相似的品格:朴素中见真情,平淡中见精神。它总是以丰厚的内涵发人深省,又总是以隽永的情思引人遐想。它同无花果一样,没有争奇斗艳之意,只有奉献甘果之心。

一

吴伯箫曾说:“自己学着用白话写作,是1925年夏天到北京以后的事。”这一时期他“满怀一种冲破黑暗,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情思,为“抨击残暴,作正义的呐喊”。吴伯箫散文创作从一开始就和追求光明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走到了时代的前沿,站在了较高的思想起点上,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优秀传统。这一创作思想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主旋律,在不同时期都闪耀着时代的光华,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动力源泉。

30年代初期,吴伯箫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先在青岛大学工作,后又到济南乡村师范、山东省教育厅和莱阳乡村师范等地方任职。这一时期,他“曾梦想以写作为业”,但“九·一八”的炮火焚毁了一切,大片国土沦陷,人民惨遭杀戮,而国民党反动派对野蛮的侵略者,只是一味地退让、不抵抗。吴伯箫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一面抽空写作,“立意是反对日寇侵略,仇恨国贼的罪恶”(《无花果》)。他曾针对“不抵抗”政策写了《黑将军挥泪退克山》,在《羽书》中表达了把侵略者从中原版图上肃清的决心,在《我还没有见过长城》中表达了抗战御侮的心愿,在《理发到差》中揭露了山东军阀韩复榘的黑暗政治。这个时期他的创作,寄寓自己对美国理想主义的折念,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或对世间的黑暗发出自己的呐喊。

在抗日救国的岁月中问世的第一个散文集《羽书》,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越旋律。吴伯箫抛弃初写散文时狭小的个人天地,把艺术的触角楔入了社会时代生活的底层和深层,用酣畅淋漓的

文字浇灌那饱受战火灾难而又富饶的土地,展示祖国、人民、历史所闪耀出的富饶无比的内涵的美。正如丰楙(王统照)在《羽书》序言中所说:“多少热情早在平静的生活中埋伏下日后开花结实的种子。”这个时期吴伯箫的散文,在追求作品内容的诚挚真切的同时,采撷和试验各种最适于内容的表达形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由朴见真的艺术风格。

1938年,吴伯箫几经辗转来到延安。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他先在抗大政治班学习,后又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抗战文艺工作组,到晋东南前方做战地宣传工作。1939年5月回延安,先后在边区文化协会和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生活的变迁,使他的思想感情随着发生了变化,在戎马倥偬的间歇拿起笔来,写眼见的战斗生活。此时,他的作品又以另一种风貌出现于文坛。他充分利用在延安工作的方便条件,访问了各根据地到延安的党政军干部,听他们介绍抗战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由于作家的生活环境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活源泉,因而他的作品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吴伯箫这个阶段的作品,主要以《黑点》和《游安风物》两个集子为主,大都以参加革命以来的抗战生活为内容。这一时期的创作以战地通讯的“急就章”居多,如《神头岭》《夜摸常胜军》等,从不同层面再现了战地生活,文笔简练,构思相对粗疏。这一时期作者发表了《向海洋》《客居的心情》《论忘我的境界》等文思隽永的散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如《向海洋》在层层递进地抒写对海洋以及临海的故土思念中,结尾时却转笔说:“我抚育过华夏祖先的土壤啊!万千年前据说你曾经也是海洋的。”“现在是土地也要沸腾起来,咆哮起来的时候了。”散文中在平铺直叙之中奇峰突起,骤然间把作品的主题扩伸到一个全新的情感境界,做到了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堪称神来之笔。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彻底改变了《羽书》的写作格局。

1942年,是吴伯箫散文创作的分水岭。这一年,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吴伯箫在座谈会上的简短发言,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延安文艺座谈会对吴伯箫的创作影响极大,使他下定决心“为人民服务”,他开始在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必要之路上,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子,使他的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又有了新的的发展。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出发点》等散文,感情奔放,

思想内涵深邃,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风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伯箫先后在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教育部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他在繁忙工作的余暇,以饱满的生活激情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沿着人民的文艺之路,继续对散文创作进行孜孜不倦的开拓,技巧更见纯熟。一支生花的彩笔偶遇万紫千红的现实,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吴伯箫面对曾经为之哀叹过的大地上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形势,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有感就发,一发就不可止,陆续写出了《北极星》《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难老泉》《忘年》等不同凡响的作品,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被誉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之外的“大家”。吴伯箫在他自己的创作史上登上了新的高度,也为当代中国的散文创作写了光彩的华章。

纵观吴伯箫的创作生涯,他以不同时期的呕心沥血之作给我们描绘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许多重要画面,透过这一雄壮而形象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一个执著地追求革命和艺术的知识分子,以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无花果”,成为人民所爱戴的卓越散文家的奋斗历程。

二

吴伯箫在散文的艺术实践中有着自觉的文体追求,为现代散文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他在《无花果——我和散文》中指出自己年轻时“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诗我是爱好的,苦于不懂得怎么写……”

“小说的题材”,是指散文的质料要有丰富的生活意蕴。吴伯箫的散文选材,惯以平易易出之,如“马”、“海”、“天冬草”、“灯笼”……无一不是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但又因为人们常与之打交道而很少去深究,一旦它们成为吴伯箫的描写对象,就显出一种平淡之中的新鲜意味。吴伯箫不少散文所写人物生动,事件真实,场景逼真,内中不少片段,有如浓缩的小说。例如《羽书》一文,作品从羽书的别称和来历说起,叙写了童年“鸡毛翎子文书”下乡的故事。文中对不同人物的衣着、语言、情态以及紧张的氛围进行形神毕现的描绘,并引发肃清侵略者之情。“诗的语言感

情”,主要指散文写作要有真情实感,语言像诗歌那样,讲究锤炼。王统照在《羽书·序》中指出吴伯箫“好锻炼文字”,“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散文的篇幅结构”则是指散文体裁要注意构思,少写散文诗。吴伯箫的散文具有浓淡天成的本色,不事雕琢的风姿。吴伯箫根据作品的主题和“整洁,朴素,自然”的美学理想,专心经营散文的结构,呈现出单纯与多样的统一,整伤与变化的统一。司马长风认为《山屋》“全篇匀称,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吴伯箫苦心追求的“回甘余韵”的佳境,他的许多散文正如他自己所言“从胚胎到分娩,正像动物一样经过几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有血有肉的生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给人的印象可能深些”。

他还说“自己妄想创的那种文体,尝试了四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成功。收入《羽书》集的有些篇目,也是‘画虎’之作。那些篇目的出世是我的梦做得最熟的时候。”吴伯箫是一个极为谦虚的人,这些话当然是作者自谦之词。他在创作初期的这种文体自觉,就题材、语言、结构和“回甘余韵”等方面的要求来看,基本上达到了。《羽书》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吴伯箫在现代散文中的地位,使其与何其芳的《画梦录》、李广田的《画廊集》等共同支撑起30年代散文园地,赢得了评论家和对读者的赞誉,成为京派散文的重要一员。吴伯箫对散文文体自觉追求的一次尝试,获得司马长风的肯定:30年代“仅有吴伯箫这个山东籍的作家,才把北方悲歌慷慨,快马轻刀的豪情淋漓尽致地吐放出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吴伯箫投笔从戎,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新的变化,但这不妨碍我们对作者创作中这一种情愫的理解,他的这种美学追求在《北极星》《记一辆纺车》《忘年》等脍炙人口的精彩篇章中,有比较完美的体现,使他在自己的创作史中攀上了新的高度。

三

语言是构成作者文风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散文,它的艺术魅力主要通过语言因素来实现。吴伯箫在《文风不是私事》一文中说:“好的文风,一要表达正确的思想,二要抒发健康的情感,三要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合乎语法,合乎逻辑。句子要短一些,去掉每一个多余的字……做到深入浅出,令人百读不厌。”如前所述,作为一个散文创作者,吴伯箫历来讲究语言的锤炼。吴伯箫早期散文创作在语言上追求丽词佳句,虽具有飘逸的音律美,但也有斧凿之痕。参加革命后,本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注重吸取大众的语言,力求做到质朴、洗练、明朗,经过长期不懈的追求,铅华尽去逐渐达到一种朴素优美、平中见奇的境界。

吴伯箫的散文写人叙事平实而不故作曲折,描绘景物素淡而不求绚丽,文笔洗练。如《作家、教授、师友》中开篇的一段:“老舍,从多年来往中

匆匆归去的时候,生怕被万种缱绻,牵惹得茶苦饭淡。”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后“亡国灭种”的时代隐忧,导致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中,也开始思考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羽书》中,“虽说山遥水阻,交通多滞塞不便,但你晓得,羽书是会飞的!虽说中原版图辽阔,足迹殆难踏遍,然而,速速速,羽书是飞得快的!虽说,敌人已布满了中原,混进了户户家家,作了户户家家的主人,但,你要明白,忿怒锁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血液都被狠毒煮沸了,即使怒不敢言,笑里也可以藏得住刀子!”在“五四”现代文学的影响下,吴伯箫已能自觉地把文艺作为“启蒙与救亡”的工具。《羽书》时期的散文创作,从审美风格上看,吴伯箫自觉实践着将散文与诗歌、小说融于一体的唯美主义的创作理念,刻意追求优美典雅、蕴藉深厚的美学风格,时而缠绵婉约,含蓄细腻,如“黄昏,正自无聊的当儿,阴沉沉的天却又淅淅沥沥的落起雨来。不紧也不慢,不疏也不密,滴滴零零,抽丝似的,人的愁绪可就细细的长了。真愁人啊!想来个朋友谈谈天吧,老长的山道上却连把雨伞的影子也没有;喝点酒解解闷吧,又往那里去找个把牧童借问酒家何处呢?你听,偏偏墙角的秋虫又凄凄切切唧唧而吟了。”(《山屋》);时而慷慨激昂,雄浑沉郁,如“有朝一日,我们弟兄从梦中醒了,弹一弹身上的懒惰,振一振头脑里的懵懂,预备好,整装出发,我将出马兰峪,去东北的承德,赤峰;出杀虎口,去归绥,百灵庙;从酒泉过嘉峪关,去安西、哈密、吐鲁番。”(《我还没有见过长城》)吴伯箫通过美的语言、美的意象,营造出了美的艺术境界,使自己的散文创作达到了巅峰时期,也推动了30年代的美文向新的高度发展。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吴伯箫早年虽然倾向于爱国救亡的文化事业,但他并未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他始终是一个“不参加在斗争漩涡之外的知识分子”。他的文学观念也不同于“左联”的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其文学创作描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作品中弥漫着重感伤的情调,具有“京派”散文唯美主义的创作倾向。换句话说,吴伯箫早期的文学活动,无论是参与文学活动、创办文艺刊物,还是进行文学创作,都是从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延续的是“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体现出了浓重的现代性意味。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

我所受到的教益说,他是老师;从推心置腹、平易相处来说,我们是忘年的朋友。”这段文字朴素畅晓,自然朴实而又精粹。写出了作者与老舍先生亦师亦友的情谊。吴伯箫的散文语言讲究简练。如“暮春,中午,踩着畦垄间苗或者锄草中耕,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作家只用4个字,就点出了观赏菜园的最佳时间。可见作家写作用笔极为节省,惜墨如金。

多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写出精彩纷呈的比喻表现事物那些微妙的难以言传之处。如“线上在锭子上,线穗子就跟着一层层加大,直到沉甸甸的像成熟的肥桃”(《记一辆纺车》),这个比喻句不仅把本体的特点表现得活灵活现,贴切自然,而且把收获劳动成果时的那种喜悦、自豪的美好意境也传达给了读者。作者所用的喻体也都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肥桃”,于平淡中显精妙,于平淡中显新奇,具有别样的艺术魅力。

追求哲理性与情趣性的统一。哲理性的语言能增强文章的分量,而如果同时又有一种趣味性,就会极大地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在《记一辆纺车》中,作者写初学纺线的而又性子急躁的人,因为断头接不好而生纺车的气,“摔摔打打,恨不得把纺车砸碎”,为此作者有趣地批评道:“可是那关纺车什么事呢?尽管人急得站起来,坐下来,一点也没有用,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待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等着无人驾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一直等到使用纺车的人心平气和了,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快慢均匀了,左手拇指和食指间的毛线或棉纱就会像魔术师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这种语言,富有情趣,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善用整伤而又变化的句式。例如:“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这是《菜园小记》一文的开头。文章开头先把种菜与种花相比较,为全文奠定了一个不追虚华,但求质朴,于平凡中出情趣的基本格调。吴伯箫追求朴实平易、清淡纯净的叙述风格,整篇均采用平易近人、白直坦拙的语言,叙事状物,几乎找不到什么华丽的词藻与奇巧的修辞。这些句子字数整齐,体现了结构的“建筑美”,而且文意相对,具有一定的内容。作者不仅注意字词之间的对称,而且还在句与句之间造成一种意味,这又是一种创新,使文意和谐整齐,意思逐段深入,增强了表现力,令人赏心悦目,悠然神往。

吴伯箫的散文创作数量虽不多,但往往以质取胜,有如丰硕的“无花果”,牢固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给我们勾画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风云,呈现了作者与时代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内心世界,闪烁着自己的艺术光华,成为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宝贵的一笔财富。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